

第五章

計畫經濟的瓦解

一、計畫經濟的肇始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意識、有目的地實施計畫經濟的國家。以強制的行政命令動員全國的資源作有計畫的、統籌運用，一切經濟活動必須和國家既定的政策、方針配合；按照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其國民經濟計畫有五個特徵。

(一) 計畫的黨性

蘇聯共產黨是計畫的倡議領導者，並且監督計畫的制定和執行。列寧提及「國家電氣化計畫」時說過：「按我的看法，這是我們黨的第二個綱領。」

(二) 計畫的科學性

蘇聯國民經濟計畫是黨與國家經濟政策的體現，以科學為其基礎。計畫的產生係根據自然與社會發展規律和現代化科技成就。

(三) 計畫的強制性

經濟計畫對所有執行者具有強制的指導力量，蘇聯經濟生活由經濟計畫決定之。一切中

央與地方組織、企業、機構負有執行計畫的義務，不按照計畫執行的，須負法律責任。

(四) 民主集中制

計畫的編制係由中央計畫領導機構和地方組織、企業及勞工群體的建議相配合，以各企業、部門、地區、共和國自下至上提出的草案匯集，而由中央編制總的計畫。

(五) 計畫的統一編制與保證執行

中央制定總的、統一的全國計畫後，各部會、機構、企業即需保證負責其實現，各單位內部的黨組織有監督的權責。

最早的經濟計畫應當是一九二〇年的「俄羅斯共和國電氣化計畫」，以電力建設為主體，當時要求蘇聯工業總生產於十至十五年內比一九一三年增加八〇%到一〇〇%。一九二一年俄羅斯成立「國家計畫委員會」，成爲正式的計畫設計研究機關。一九一九年四月俄共（布黨）第十六次全國黨代表會議通過該委員會擬定的第一個五年計畫草案，五月全蘇蘇維埃代表大會（國會）批准。但是該五年計畫事實上早在一九二八年第四季開始實施，並且提前在一九三二年底完成計畫任務；其任務爲消除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建立現代化重工業和施行農業集體化。

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共革命成功後迅即導致內戰爆發，至一九二〇年底結束戰爭，但當年

經濟生產祇有一九一三年的五分之一。在這個「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俄共集中一切資源應付內戰需求。戰後為緩和民怨和紓困，實施「新經濟政策」准許私人企業家在一定範圍內有合法的活動，以糧食稅代替徵收糧食，放寬私有商業活動。一九二二—二三年間，四分之三的零售貿易由私人經營，國有與合作社商店祇占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十。蘇俄國有工廠數祇占總廠數的八·五%，不過勞工占全部工業工人總數則高達八四%。

新經濟政策時期，形成「混合經濟」，由政府繼續控制大工廠、金融機構、運輸事業、國際貿易，以及部分國內貿易網；農業方面，出現成千上萬的小農場。列寧對這種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新經濟制度稱為「國家資本主義」，認為這是在無產階級管制下前所未有的國家資本主義。

但是在經濟生產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水平後，蘇俄政府開始限制私人資本，一方面擴大國營與合作社批發零售系統；對私營貿易商採取高額利潤稅，限制他們自國有企業購進商品。私營貿易商的貿易量在一九二八年降至總零售量的二二·五%，一九三〇年更減為五·六%，一九三二年全面禁止私人交易。

二方面對私人工業課徵重稅，限制原料和信用貸款的供應，一九二六年私人工業生產占全國總生產的一九·九%，一九三〇年祇占五·六%，一九三二年祇剩下〇·五%。

三方面則實施農業集體化，徹底消滅富農與自耕農，從一九二九年開始至一九三六年止，集體農莊共有二十四萬五千七百個，農戶達百分之九十，實際占有全國的耕地面積。強制集

體化過程，農民採取廢耕、宰殺牲口、破壞資產方式反抗集體化，當局則以威嚇利誘，甚至槍決、放逐、勞改懲處反對者。從而造成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二年的大饑荒。

二、戰爭與復原

第二個五年計畫（一九三三—三七年）的政治任務是徹底消除資本主義成份，完全消滅產生階級差別和剝削的根源；經濟任務是完成國民經濟技術改造，在所有的經濟部門建立新技術基礎。第三個五年計畫（一九三八—四二年）要求完成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保證工業快速增長。此一計畫因德蘇戰爭而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中輟，到一九四五年期間採行戰時經濟措施。在這三個五年計畫期間，動員全國資源於生產事業，特別是在重工業部門，顯係為蘇聯貯積龐大的備戰能力；尤其在第三個五年計畫，將西部地區的重要工業設施遷往烏拉爾山以東和西伯利亞西部地區，並在該區域建設新工業工廠，減輕大戰的損失。而且在戰爭爆發後四個月內將一千五百廿三座工廠撤退到東部地區；戰時的投資百分之九十三屬於重工業。

在德蘇戰爭最後三年期間，蘇聯工業平均每年製造的戰車、自走砲與裝甲車超過三萬輛，飛機約四萬架，各種口徑的火砲十二萬門，輕重機關槍約四十五萬挺，步槍逾三百萬枝，衝鋒槍約二百萬枝。一九四四年一年生產的各種砲彈、炸彈與迫擊砲彈總數超過二億四千萬顆，

槍彈超過七十四億顆。而且據估計，戰時最高產量一年可能超過飛機五萬架，戰車四萬輛，火砲十五萬門。當然，盟軍在租借法案下供應蘇聯的軍需物資總值達一百卅億美元，協助史達林在東線擊潰納粹部隊，功不可及。在一九四五年初，蘇聯部隊總數逾九百萬人，擁有十四萬門大砲，一萬六千多輛裝甲戰車和自動砲，二萬三千架飛機，構成勝戰優勢。

但是戰爭的損失亦甚可觀，估計蘇聯人員傷亡逾二千萬人（在一九五〇年，人口結構中，男性祇占四三·九%，女性占五六·一%，出現大量的戰爭寡婦和失婚婦女）。國家財富損失約三〇%，全部物資損失與支出達二萬五千六百九十億盧布（按戰時幣值）；一千七百個城鎮、七萬多個村莊、六百多萬建物燬於戰火，有二千五百萬人無家可歸。德軍劫掠屠殺一千七百萬頭牛隻，毀損九萬八千個集體農莊、一千八百七十六個國營農場和二千八百九十個拖拉機站；破壞三萬二千個工廠、六萬五千公里鐵路、四萬所醫院、八萬四千所學校設施、四萬三千個圖書館。

戰後復興建設（在一九四六—五〇年第四個五年計畫期間）迅即恢復戰爭損失，工業生產在二年半後已恢復戰前水平，這不能不歸功於計畫經濟制度下的詳密規畫、集中資源作系統分配；以及大量的外援，包括戰利品。美國在戰後給與蘇聯兩億五千萬美元信用貸款，聯合國救濟復興委員會亦提供價值二億美元的物資。蘇聯在一九五〇年以前搜刮外國的戰利品（貨品、勞務、資本設備與財政資源）估計達四〇億—五〇億美元左右。其中對中國東北的搜刮達二十億美元（蘇聯自稱祇有九千五百萬美元）。

三、赫魯雪夫的神話

第五個與第六個五年計畫（一九五一—一九六〇年）及復興建設前後十五年之間，蘇聯經濟成長迅速。以一九六〇年與一九四〇年相比，蘇聯固定資產增加二·二倍，國民所得增三·四倍，生產力增三倍。個別產品增長：電力二·九二三億度，增五倍；石油一四、八〇〇萬噸，增三·七五倍；煤炭五億一千萬噸，增二倍；鋼鐵六千五百三十萬噸，增二·五七倍；穀物一億二千五百萬噸，增三〇%。這種快速成長使當時蘇聯領導誤認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無論如何，蘇聯領導人畢竟經歷了兩個世界大戰，亦體嚐了一窮二白的滋味；一旦成爲暴發富，難免產生錯覺。

一九五九年元月，第二十一次黨代表大會決定自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改行七年經濟計畫，在未來二十年內爲「共產主義社會」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赫魯雪夫向共產天堂邁進的幻想正式書之於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二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赫某計畫在七年計畫完成時，蘇聯人平均工業生產量將超過英國和西德，而且使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各共黨國家）的工業產量達世界總產量的半數。黨綱述明到一九七〇年蘇聯工業生產將超過美國，到一九八〇年將遙遙領先美國。赫魯雪夫超英趕美的幻想，隨著一九六三年農業大歉收，一九六四年被迫下台而告終結。繼起的新領導布里茲涅夫將七年計畫當作第七個五年計畫。

按照當時黨綱列舉的指標，到一九八〇年蘇聯電力生產爲二萬七千億度——三萬億度，鋼鐵爲二億五千萬噸；而人民的生活水準將不遜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事實上，到一九八九年蘇聯一年電力產量祇有一七、二二〇億度，鋼鐵產量一億六千萬噸。至於人民生活水準更不用提了。

赫魯雪夫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幻想卻未因其下台而消失，繼任者仍然秉持該理念不捨。布里茲涅夫主導的第八、九、十、十一個五年計畫（一九六六—八五年），依然標榜著要建設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不同的是，布某認爲蘇聯社會處於已發達（已開發）社會主義社會階段，此一階段正逐步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惟過渡期是遙遠、漫長，尙難定下期限。七〇年代蘇共領導和馬列主義理論學者主張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從低度開發逐漸成長爲高度開發，亦即已開發的階段；蘇聯和東歐國家都應屬於已開發社會主義社會，而且準備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在這個過渡階段，蘇聯是由知識分子、勞工、農民組成的全民國家，祇有社會階層的劃分，而無階級分野和矛盾對立。蘇聯各大小民族逐漸融合爲新「蘇維埃人」，當然不存在種族歧視和衝突。蘇共的目標是動員全民努力建設高度生產效率和高科技生產設備的經濟體，提高生產量與品質，提高人民消費、生活水準，使整個經濟體和社會面逐漸符合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標準條件。

但是，現在的蘇共已不同。戈巴契夫上台後正視蘇聯經濟、社會問題，認爲蘇聯不是已

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開發中、發展中的社會。除掉核子武器外，蘇聯祇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根本談不上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問題。相反地，蘇聯需從頭做起，回歸列寧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政策、措施。蘇聯政治、經濟、社會學界學者已開始討論、研究早期列寧的著作、思想和作爲；認爲祇有回歸列寧才能拯救蘇聯。現今蘇聯的一切是被史達林所歪曲，引入歧途。

四、計畫經濟的本質

制訂經濟計畫或專業項目的計畫並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不過像這些國家經常制訂名目繁多、範圍深廣的計畫，卻是西方國家和我國所莫能及的。例如，蘇聯以五年期和一年期「國家社會暨經濟發展計畫」最爲常見；這是涵蓋全蘇經濟、民生、社會的總體經濟計畫，在五年計畫下，又按年度實施一年期計畫。此外，偶爾還有「糧食綱領」，生產糧食計畫；十年期和廿年期的遠程經濟計畫；廿年期的科學技術發展計畫；以及區域性經濟開發計畫等。簡言之，下自工廠、企業、公司有其各種計畫，中自地方政府、地區有其開發計畫，上至共和國、蘇聯有全國性、專業性計畫。易言之，在這些國家，任何大小事務均需有計畫，按計畫做；沒有了計畫，就不知道應如何做，不是停擺，便是陷於一片混亂。

這種計畫經濟起源於其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馬克斯根據他對十九世紀歐洲產業革命興起

後，發生的資本主義弊病的觀察。認為要解除無產階級勞動群眾被資本家肆意剝削剩餘勞動價值的痛苦，使勞動者獲得應有的勞動報酬（即各盡所能、按勞取酬），必須以暴力革命攫取生產資料（工廠、機器設備、原料等），化私有為公有（社會共同所有）；亦即由工人當家作主。因此，國有化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條件。由無產階級建立的國家（共產黨或工人黨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政權的代表人）既然擁有全國所有的財產，包括土地、地下資源和生產資料等等；就需要有管理、經營、增殖財富的政權及其人員。馬克斯主義既然自稱是科學共產主義，自然要以科學方法管理社會主義國家的財產；而有計畫的、按經濟規律經營管理和發展生產事業、國有財產自屬必要。

生產、分配和消費需按計畫的比例、均衡的發展。生產資料生產工業（重工業）和消費資料生產工業（消費品產業）的投資、產量按照政策、計畫規定進行，兩大工業系統有一定的投資比例。過度偏重重工業，將相對減少消費品工業的資源分配和導致生產不足、市場缺貨。過度偏重消費品生產，將使市場充斥無法銷售的商品，相對造成浪費和奢侈現象；而且嚴重影響國家基礎建設。資金、資源、勞動力的分配各有其計畫比例和需求。例如，投資資金來自國家預算撥款和貸款，而歲收主要來源為週轉稅（類似貨物稅）和企業上繳利潤，歲出亦以國家投資和社會支出為主。投資藉以擴大再生產，社會支出用以維持社會安定和保障（例如養老撫恤、免費的教育和醫療、獎助學金和各種津貼）。國家投資多，社會支出少，亦會影響人民對政府的向心力和支持；投資多、生產多，但人民消費能力弱，亦會形成商品積

壓，資金浪費。因此，按比例、均衡發展經濟各個環節，非有計畫不可。

五、經改連連

已故蘇共總書記安德洛波夫說過蘇聯「至目前仍未研究社會生活與勞動應有的規範，未完全揭開其規律的本質，特別是經濟方面。因此，不得不採用經驗法則，亦即全然不合道理的『試誤方法』（methods of try and error)」。由於馬克斯祇顧著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的罪惡，卻忘了或無力於研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天堂；留給其信徒的祇是一個模糊朦朧的天堂遠景。等到列寧在資本主義最不發達的俄國建立新政權。因為十月革命並非如馬克斯預言的應該爆發於工業發達的國家，相反地是列寧一派強硬地將其兌現於資本主義世界最薄弱的環節上。列寧面對親手開創的天下顯然亦有無從著手之感，憑著馬克斯主義夢幻般的遠景素描，加上內戰時期的戰爭經驗，在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紓困救急方式；也祇是製造出一堆後來令戈巴契夫抱怨的遁辭：「列寧關於社會主義的解說過於簡化，往往失去其理論深度和意義。這些包括像社會所有制、階級與民族關係、勞動程度與消費尺度、合作化、經營方法、政權與自主管理……等關鍵性問題。」換言之，列寧在世五十四年並未為社會主義或其經濟、社會制度作出詳盡的規劃、解釋。一九二〇年列寧所說的「蘇維埃加國家電氣化等於共產主義」，這套公式徒然使其徒子徒孫誤入歧途。時至今日，蘇聯有人倡議放棄蘇維埃這個政治制

度名辭，而國家電氣化這個代表經濟建設和制度的用詞亦漸失其意。

正由於馬列主義沒有闡述社會主義社會應有的面貌或內涵。導致共黨國家在建立國有化的計畫經濟制度和推動經濟計畫過程，必須採用不合理的試誤法則，也就造成不斷進行經濟改革的窘境。

事實顯示，共黨國家推動一項經濟決策或改革之前，事先會作小規模試驗，其結果認係可行或可取，才全面照搬照用。例如，一九八三年七月蘇聯公布「關於擴大工業生產企業計畫與經營活動的權力措施」（簡稱企業實驗法），給予生產企業更多的經營自主權。從一九八四年選定若干企業為試驗對象，認為成效不錯乃決定擴大範圍至全部企業。像中共過去的「農業學大寨」和江青的「桃園蹲點」都屬試驗性質。但是小型試驗往往因領導人的政策偏好而失真，以及誇大宣傳；如同我們往昔熟知的，當大人物蒞臨某地、某單位參觀時，呈現的是與事實不盡相同的、最好的表現面。

在史達林逐步縮壓新經濟政策，強制私營企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過程，採取的是以政策導向來創造經濟規律，以趕盡殺絕和勞改放逐對付反抗者。違反了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赫魯雪夫時期，鑒於農業生產意願低落，准許給與農民少量的宅旁園地（自留地），農民可將自耕農產品和規定自養頭數字的畜牧產品在自由市場出售。同時被迫取消拖拉機站，將農業機械轉售集體農莊。而赫魯雪夫實施的大經濟區計畫（配合大經濟建設，改組黨政管理組織），造成黨政經三方面管理的混亂，和黨幹部控制經濟生產的權力，形成外行領導內行。

一九六五年蘇聯總理柯錫金提出「改善工業管理、完善計畫工作和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三個層次的改革方案。工業管理由過去的區域性「國民經濟委員會」負責改由政府部會按工業部門管理，將一些工業和建築業的計畫、管理責任交給共和國部會自行負責。（負責管理各類工業的部會分三種，一是蘇聯與共和國相互轄屬的蘇聯—共和國部，二是蘇聯有、而共和國不設的蘇聯部，三是蘇聯不設、而共和國設立的共和國部）。同時設立「生產聯合」，管理下屬同類型或異類型生產企業（即工業企業縱或橫的托拉斯聯合），形成部會—聯合—企業三級管理制。

計畫工作方面，著手制定長期性各種經濟、科技、社會發展計畫；在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設立計算中心總局，蒐集處理資訊；計畫的重點在注意經濟發展比例和均衡，包括國民收入、財政資源、勞動力、生產材料的均衡（支出與產入平衡）。

經濟刺激方面，修定企業各種經濟指標，包括以產品銷售量代替總產量指標。過去的笑話是，當指標設定為生產數量時，工廠就拚命生產小鍋子、小物件；指標設定為生產重量時，就全力生產特大鍋子、大東西；完全不顧市場需要。結果是超額完成生產計畫，但產品卻堆在倉庫賣不出去，市場缺貨。

一九七九年布里茲涅夫繼柯錫金改革再提出「改善生產效率與工作品質」計畫。以淨產值代替總生產或銷售值指標；提高生產獎金鼓勵利潤率和銷售值的增長；增加對新型產品的獎勵；企業營運資金改由銀行貸款和內部基金供應，不由政府撥款；提高批發價格和准許新

型產品加價。

六、計畫經濟的積弊

1. 心態問題。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制度係建基於財產權的國家（全民）所有和集體（合作社）所有；在一九八八年底，按蘇聯官方統計，全蘇總資產共四萬一千億盧布（不包括土地、地下資源和森林）。其中，固定資產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億盧布（生產性固定資產一萬八千零八千十億，非生產性八千九百十億），人民家產七千九百億盧布，物資材料六千億盧布。往昔，蘇聯公民不是就業於國家機關或企業，就是在集體農莊或合作社當農民、社員。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就業者受僱於國家，包括國營商店店員、餐廳服務員、旅館侍役、計程車司機；換言之，大家都是國家僱用的公務員。每天面對著、經營著國家資產，這些資產亦是全體人民共有的；就業者的心態如何，可能複雜多了。至少有一部分人會把它視作無主之物，任意毀損、偷竊。一九八五年登記有案的侵占國家和社會財產的犯罪案卅一萬七千三百件，另外小額侵占的六萬一千七百件。一九八八年前項二十八萬零三百件，後項三萬六千四百件；件數減少並非意味著犯罪事實降低，祇是社會亂了，大家不管了。而未登記或發現者，恐怕不在少數。由於「你的是我的」共產心態，社會主義經濟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這種不健全的心理狀況。

2. 管理問題。在行政命令體制下，各級生產主管（廠長、經理）和單位、機構負責人都

屬派任；這是官僚抱著祇要不出錯，按時完成經濟任務的苟安心理。對於增進生產、增進品管等額外要求，能免則免；反正升官靠人際關係、要黨性好。對工人而言，完成生產任務第一，多做不多得、少做不少得、獎金大家分，大鍋飯養成懶漢。工作獎金已變相成爲薪水的一部分。工廠提報計畫時，一定壓低生產能力和計畫產量，以便年年超額完產、超額銷售。結果是生產力祇發揮了七成、八成。

3. 科技品質問題。西方科技突飛猛進、新式產品推陳出新；蘇聯也有不少的科技發明，但引用者少。原因在於工廠設備多建於五〇、六〇年代，負責人無意願引用新技術（工廠需停工改造、工人要再訓練），本身也無此種新知識。形成老機器、舊產品，能源、材料消耗大的現象，而且大半的基本建設投資都投入維修、改造，無法全力於高技術的新廠建設。

蘇聯產品以傻、大、粗、笨出名，更糟的是品質差、花樣少，消費者幾無選擇餘地，除非用外幣買舶來品。出廠的電視機，用不到一年就有三分之一要修理；著名的紅星手表，鏽得快。工業產品既然差，祇好請共黨兄弟國家幫忙使用；要賺外匯，祇有向西方大賣石油、瓦斯、原料，不需加工製造，無品管問題。

4. 計畫問題。工業與農業之間、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經濟與社會之間等層面的投資、發展需按比例、均衡進行，但是在政策導向下，經常出現重工輕農、重重輕輕（重視重工業、忽視輕工業）的計畫偏差，祇求經濟發展而忽略民生需求。結果是消費品缺乏、住宅不夠，而人民手中的盧布卻一大把。

同時，整個國家活動納入計畫範疇，巨細靡遺，幾乎是難以想像的。一九八八年，蘇聯國營與合作社商店七十三萬六千家，公共食堂（餐廳）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家，生活服務行業三十二萬二千六百家，中小學校十三萬五千所，幼稚園和托兒所十四萬七千四百家，大專院校八百九十八所，醫院二萬三千五百十九所，診所四萬一千三百十家，工業企業四萬六千四百個（僱員勞工三千七百卅六萬人），集體農莊二萬七千二百個，國營農場二萬三千三百個，其他農業單位二萬零六百個。通訊、運輸、金融、公共事業等單位尚不計入。要將社會、經濟活動和發展做好計畫工作確實不易，更不用說去督導、檢查了。因此發生過幽靈企業的怪事。在一群人經手下，國家作了投資，有計畫、有建設、有生產，年年上繳計畫成果，結果發現該工廠根本不存在，所有經費被吞沒了。

而且計畫與執行成果的差距使計畫經常陷於修正、變更。上游工業出不了貨，下游進不了料亦無生產，內外銷計畫就完了。農產歉收，必須緊急向外採購，輸入大批小麥、乳肉，外匯緊俏；連帶必須削減計畫的生產設備或工業產品，計畫也變了。最後，會令人懷疑生產報表是否是事實，有無造假；紙上數據似乎與實際面有了隔閡。

七、經濟成果與統計

無論是資本主義世界，或社會主義世界，執政政府總喜以經濟數據顯示其政績；但是對

蘇聯而言，更喜歡誇示其執政數十年輝煌成果。因此在統計上，經常出現倍數計算，特別在俄文用辭習慣有誇大傾向。例如一九六〇年國民所得是一九四〇年的四·四倍，亦即增加三·四倍；但在用辭上習用為增加至、成長為、提高為四·四倍，如果對俄文前置詞稍欠認識，會對其加一倍的數字感到困惑。有時，其語文上的「兩倍、三倍」，實際應理解為「一倍、二倍」。

按其倍數統計，與一九一七年相比，一九八五年的社會總產值（物質生產毛額）是一二七倍，來自生產的國民所得（物質淨產值）是一三七倍，生產用固定資產六十一倍，重工業（生產資料生產工業）六六九倍，輕工業（消費資料生產工業）九十九倍，農業五·一倍。

重要工農業生產數值，如下列：

項目	一九一七年	一九八五年	一九八九年
電力(億度)	二二	一五、四四〇	一七、二二〇
石油(百萬噸)(包括 瓦斯凝結液，一噸石 油約等於七·三桶容 量)	八·八	五九五	六〇七
天然瓦斯(億立方公 尺)	—	六、四三〇	七、九六〇

煤炭(百萬噸)	三一·三	七二六	七四〇
鋼鐵(百萬噸)	三·一	一五五	一六〇
鋼材	二·三	一〇八	一一六
化學肥料(百分之百 純度計算)(百萬噸)		三三三·二	三四·三
紙張(千噸)	一五五	五、九八六	六、三〇〇
水泥(百萬噸)	一	一三一	一四〇
各類紡織品(百萬平 方公尺)	一、二一二	一二、〇五二	一三、一〇〇
拖拉機(千輛)		五八五	五三二
穀物(百萬噸)	五四·六	一九一·七	二一·一
原棉(百萬噸)	〇·五	八·八	八·三
肉類(屠體重)(百萬 噸)	四·三	一七·一	二〇·〇
乳類(百萬噸)	二四·二	九八·六	一〇八·一

蘇聯各項生產在世界排行榜上，一九八六年占世界首位的產品分別是：石油、瓦斯、生鐵、鋼鐵、焦炭、化學肥料、鋸材、羊毛織品、鞋類、糖用甜菜、向日葵籽、洋芋、乳類、蛋類、砂糖、拖拉機。同年占世界第二位的，有：電力、硫酸、機器製造、水泥、木材輸出。

和美國相比較，一九八六年蘇聯工業總產值占世界第二位，為美國工業總產值的八〇%，農業總產值（一九八一—八五年每年平均）祇有美國的八五%。國民所得是美國的六六%。工業勞動生產效率是美國的五五%，農業勞動生產效率不到美國的二〇%；易言之，美國一個工人抵得上蘇聯二個工人，一個農民抵得上五個蘇聯農民。

就總體經濟表現而言，一九八八年蘇聯國民總生產毛額（GNP）是八、七五〇億盧布（按官方匯率，一盧布約為〇·六五美元），約合一三、四六〇億美元；一九八五年是七、七七〇億盧布，一九八〇年六、一九〇億盧布。蘇聯國民總生產平均每年成長率：一九六六—七〇年是七·六%，一九七一—七五年六·二%，一九七六—八〇年四·八%，一九八一—八五年三·六%，一九八六—八八年三·九%。最近數年的成長率是：一九八四年四%，一九八五年二·三%，一九八六年三·三%，一九八七年二·九%，一九八八年五·五%，一九八九年三%。過去二十多年成長率明顯地下降，即使在戈巴契夫當政後近五年，成長率低落又不穩定的情況並未改善。

一九八八年社會總產值（未扣除物料支出的全國物質生產值）是一五、二五〇億盧布，其中工業產值九、一二四億，農業二、五九七億，建築業一、六五五億，運輸與通訊業七三

項目	年代					
	一九六—七〇	一九七一—七五	一九七六—八〇	一九八一—八五	一九八六—八八	一九八九
國民總生產毛額	七·六	六·二	四·八	三·六	三·九	三
社會總產值	七·四	六·三	四·二	三·三	三·一	—
來自生產的國民所得	七·八	五·七	四·三	三·二	二·八	二·四
工業總產值	八·五	七·四	四·四	三·六	四·〇	一·七
重工業產值	八·六	七·八	四·七	三·六	四·〇	—
輕工業產值	八·四	六·五	三·八	三·七	四·〇	—
農業總產值	三·九	二·五	一·七	一·〇	三·〇	一·〇
基本建設投資	七·三	六·七	三·七	三·七	七·一	〇·六
國民經濟利潤	一五·四	九·九	四·五	六·一	九·三	四·〇

五億，貿易、物質技術供應、倉儲及其他部門一、一三九億。來自生產的國民所得（扣除社會總產值內的物料成本支出，即物質淨產值）一九八八年是六、三〇八億盧布，其中工業二、六九五億，農業一、四三三億，建築業八〇六億，運輸與通訊業三八七億，貿易、物質技術供應、倉儲及其他部門九八七億。

各項經濟、社會發展平均每年成長率如左表所列：

社會勞動生產效率	六·八	四·五	三·三	二·七	二·八	二·三
平均每人實際所得	五·九	四·四	三·四	一·八	一·四	—
國營與合作社商店零售額 (不含酒類銷售)	八·一	六·四	四·二	四·〇	五·四	—
對外貿易總額	八·三	七·七	五·三	三·九	二·〇	—

八、計畫經濟的末途

明顯地，蘇聯經濟在七〇年代開始走下坡，勞動生產效率不僅不如美國，亦遠遜於戰後復興的日本、西德。一九八三年蘇聯經濟學者提出「新西伯利亞報告」，指出過去十二—十五年經濟成長明顯衰退。原因在於現行蘇聯經濟的國家管理制度雖形成於五十年前，這套制度亦再三調整、更新和改進，但未能作本質的改造使其反映生產力根本改變的狀況。該報告逐項批判蘇聯經濟制度，包括生產關係（所有制和勞動者的關係）。由於勞動者受僱於國家，對生產結果和引進科技生產方式就無法寄予關心和興趣。在世界科技日新又新之際，蘇聯勞動者和管理官僚卻視若無睹，生產品質與勞動效率自然隨之低落。

計畫經濟本身就不是競爭性的經濟體，缺乏生產者市場和健全的消費市場；前者國家按計畫供應生產企業所需原材料和能源、燃料，生產者不需從市場覓取廉價的材料，亦無需努力節約材料的消耗；後者國家以補貼價格低價銷售民生必需品給都市居民，造成政府每年數達百億盧布的補貼。一九八七年六月，戈巴契夫指出從國家預算支付的補貼一年高達七百卅億盧布。不但形成龐大財政負擔，而且造成鄉村農民進城採購糧肉食品和日用品的不正常現象。甚至有些農民向國營商店購買麵包回去餵牲畜的浪費情形。

生產企業在計畫供應原材料體制下，擔心供應量不足，遂拚命囤積原料；這些囤積數額達三千億盧布（加上企業流動資金共計九千億盧布），成爲企業額外負擔。過多的儲備和資金明顯地不是良好的營運方式。這種現象即是我們熟知的「呆料」太多。

一九八六年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就業職工一億一千八百五十萬人，外加集體農莊農民一千二百六十萬人；共一億三千一百十萬人，占總人口的四六·五%。幾乎是完全就業的狀態，即使其中有些重複的，農民兼作建築工。這些勞動者在其工作崗位似乎都是多餘的。例如旅館內每一層樓，都有婦女當班管理房間鑰匙，藉以監督住客出入。工人在工廠、農人在農場，拚命磨洋工，下工回家則兼副業，搞地下經濟活動。反正是集體勞動，少一分力氣不會少一分表現。蘇聯各級政府行政人員在一九八八年比一九八五年裁減了二三%，五十三萬多人；在國營生產部門裁了一百五十萬人。「呆人」太多，一遇改革便需整頓了。

最後，蘇聯計畫經濟制度好像一幢大廈。在列寧、史達林的社會主義理念下，開始工業

國有化、農業集體化。以空前的政治政策進行經濟建設和建立計畫經濟制度，猶如一批外行的建築家開始蓋立一幢大廈。當大廈建成後，發現門板不對門框，樓梯不對走道，水管不通龍頭，房子雖大，柱子太多，空間有限；於是開始修修補補，東打洞、西造牆。這幢七十餘年的大廈經年累月的敲敲打打，目的無非使之適合人類安居暖住；可惜的是敲打之下，一方面住的人群逐漸失去耐心，另一方面更難與他幢大廈（資本主義住屋）媲美。在這種情況下，又不能把死去的建築師鞭屍挫骨，又捨不得丟下七十年的基業，真是難以定去向。

圖六：蘇聯全國總財富

資料來源：蘇聯政府公報，1990年，第14期，頁四。
 註：全國總財富不含土地、地下資源與林源；固定資產包含牲畜。

